

· 历史学 ·

明代贵州的移民及影响

吕善长¹ 张明²

(1. 安顺学院屯堡文化研究中心, 贵州 安顺 561000; 2.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明代贵州的移民种类主要有军事移民、民籍移民和仕宦谪迁三类,其中军事移民的数量最多,影响也最深远。笔者保守估计,明初仅军事移民的人数就超过一百万。一百多万的汉族移民对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风 and 民族关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明代; 贵州; 移民种类; 影响

论文编码: Doi: 10. 3969/j. issn. 1673 - 9329. 2014. 04. 24

欲了解明代贵州移民的情况,应先了解元代贵州的人口状况,否则移民问题就无从谈起。贵州自元代始纳入中央政府管辖,当时分属湖广、四川、云南、广西等行省,后置八番顺元等处军民宣慰司、都元帅府。元政府对今贵州地区的管辖基本上以羁縻为主,实行间接管理,主要是任命各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官,给以印信,让其管辖各自族人、部落。这种情况直到明王朝大规模地移民贵州才得以极大改变。

一、移民的种类

明代人口流移的类型,董春林等认为有三种:政府组织的迁移、局部人口相对过剩造成的迁移及自然灾害引起的迁移^[1]。而明代贵州的移民种类,按古永继的观点主要有仕宦任职、军士留戍、谪迁流放、自发流移四类^[2]。笔者认为明代贵州的移民种类主要有军事移民、民籍移民和仕宦谪迁官员三类。其中,民籍移民又包括明初的民屯、商屯,以及后来逃荒、流亡、经商等定居于此的移民^{[3]59}。

明代贵州的移民中,移民数量最多且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军事移民。明王朝派大军征服云南,而贵州作为中原进入云南的最为便捷之地,战略地位

凸显。为了保障征滇顺利,朱元璋决定在具有战略地位的地方建城设卫。统一云南后,为了确保西南边疆的安全,“至如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也”^{[4]2225},逐步加大设立卫所的步伐,进行大规模的军事移民。洪武时期在今贵州境内设置20多个卫所,其中,除地处贵州东部边沿的五开、铜鼓、平溪、清浪、偏桥、镇远等六卫史称“边六卫”,属湖广都司管辖外,其余大都属贵州都司管辖。^①

有关明代前期贵州都司所辖正军数存在不同说法。《明实录》记载:成化三年,贵州巡抚李浩奏称贵州军额旧有十六万余^{[5]0797}。隆庆六年巡抚贵州都御史蔡文奏称贵州所属二十卫所额军一十三万七千余名^{[6]0048}。之所以贵州都司所辖卫所原有旗军额数出现如此大的差别,最大的可能是“原有”、“原额”所指代的时间不同,有的是依据洪武时期,有的是以永乐年间的的历史数据资料,也有可能根据永乐以后的数据。因无相关资料,只能作一推测。因五开、铜鼓、镇远等卫所位于湘黔驿道上的“边六卫”属湖广都司管辖,贵州方志多不载其编制军额。但康熙《湖广通志》却明确记载明代(确切说应是明初)的军额数:

表1 明代湖广都司所辖贵州卫所军额

卫所名	清浪卫	偏桥卫	镇远卫	平溪卫	五开卫	铜鼓卫	天柱所	汶溪所	合计
军额数	6 244 名	5 600 名	5 600 名	5 614 名	32 261 名	18 036 名	1 112 名	1 108 名	75 575 名

资料来源:康熙《湖广通志》卷之八《兵防》

收稿日期: 2014 - 04 - 04

基金项目: 贵州省政府招标项目“贵州省六百年社会史”课题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吕善长(1981 -),男,河南邓州人,安顺学院屯堡文化研究中心讲师,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张明(1970 -),男,贵州印江人,历史学硕士,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地方史。

明代前期贵州都司所辖 20 卫所,除去今属四川省的永宁卫和普市千户所外,笔者按十五万人计算,加上地处湘黔驿道今属黔东南的“边六卫”七万五千余名军卒,这样贵州明前期移入的军伍将近有二十三万人。显然,卫所军士并非军事移民的实际人口数,这是由军屯人口结构的性质决定的:军余关系和家庭关系^{[7]19-20}。“军余关系”,著名史学家王毓铨认为按明代的军政制度,每一军户出正军一名,每一正军携带户下余丁一名,在营生理,佐助正军,供给军装等。余丁也有妻小^[8]。

明初,今贵州所属各卫所正军大都来自内地长江中下游和中原地区,年纪相对年轻,基本可称为“核心家庭”。笔者保守地按每户三人算^②,今贵州在明初所移入的军户人口就接近 70 万人。如果加上余丁及其家属,移入今贵州的军事人口至少超过 130 万人。这对当时地广人稀以少数民族为主的贵州来说,数量相当庞大。

军户人口并非一直稳定,可能因将官奴役盘剥士卒,频繁战争,应役士兵逃亡,兵制改革及疾疫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7]20-22}。如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户人数不断耗减。早在成化年间,贵州巡抚李浩就称因“调遣亡叛事故今止二万八千余人”^{[5]0797}。隆庆末年贵州巡抚蔡文奏称“今见存者仅一万八千,行伍十分空虚,地方不堪保障”^{[6]0048}。

民籍移民,或称一般性移民,包括明初的民屯和商屯,及以后因逃荒、流亡、经商等定居于此的移民。

民屯,《明史·食货志》说:“其制,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9]1884}贵州地区的民屯情况,正史无考,因此存在争议。^③笔者据道光《安平县志·建置沿革》、民国《续修安顺府志》及大量家谱,还有与西秀区、平坝等地老人访谈口碑都有“调北填南”的说法,以及“背手”“解手”传说。说明民屯在今贵州部分地区也曾广泛存在^{[3]59}。

商屯,《明史·食货志》载:“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9]1885}又云:“明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9]1939}商屯与“开中”关系密切。因贵州驻军极多,且距内地遥远,交通极为不便,虽有军屯,粮食仍不足用,所以政府招募商人来贵州纳米换取盐引。贵州粮盐俱缺,故“开中”甚盛。据《明实录》记载,早在洪武十五年征服云南时就在普定、普安、乌撒等卫纳米中盐^{[4]2241}。弘治年间因镇压苗民叛乱还在都匀、清平等地招商纳粮^[10]。当然,“开中”

不能与商屯划等号,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把大量粮食运到贵州,非常困难,最经济的措施便是就地召集民众屯种,生产粮食换取盐引。因此,凡有“开中”的地方都可能有商屯存在^[11]。

明中期后,定居于贵州境内的“贩商、流徙、罢役、逋逃”的江右、川、湖等外省人口逐渐增多。其中籍贯属四川和江西的为最。嘉靖《贵州通志》称:“蜀中、江右之民侨寓于此者甚众。买田宅长子孙者盖多有之。蜀中、江右既不得其用,而视贵州官府亦漠然。若不相干,是并失之矣。”^{[12]403}当时,这些侨居贵州的外地人仍游离于贵州的赋役制度之外。也有不少流移之民被编入里甲体系。如程番府“郡多江西、川、湖客民杂处”^{[12]335},程番府属新设,连当地苗民都被迫服役,更何况汉民了。嘉靖时期,巡抚贵州都御史刘大直目睹屯田荒芜,令各卫所“清查前荒田地,招集军、民、流、商诸人芟秽耕种,许以三年成熟照数纳粮”^{[12]393}。通过招集流、商开荒承种的方式把流移之民纳入户籍管辖,使之成为编户。除了卫所的大量的抛荒屯田吸纳流民外,一些府县的抛荒田土也吸纳大量移民。如程番府“抛荒田亩不等,招集哨堡、土、流、客民诸人不一佃种。”^{[12]395}思南府的居民构成,外来流寓者占了多数。“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陕西、江西为多”,这些人迁来时间较久,已成土著居民。特别是陕西人是宣慰司田氏的羽翼,“各司正副官与里之长是也,多巨族,负地望”,而江西人“皆商贾、宦游之裔,多读书,乐仕进”^{[13]492}。这些人是思南府的社会上层。弘治以后,因四川兵荒,思南府的土著大姓将荒山招佃以安插四川流民,而思南适宜棉花生长,“流移之人,亲戚相招,纒属而至,日积月累,有来无去”,最终形成“客既胜而主人弱”的局面^{[13]539}。新移民的川人数量超过了老移民的陕、赣人,引起当局的恐慌。

仕宦、谪迁及流寓一般都有一定期限,到期后要么迁调到其他地方做官,要么返回故里。但也有部分谪迁流寓官员因各种原因扎根于此繁衍生息。因数量很有限,不作赘述。

二、移民的影响

明初,上百万的官兵和各阶层汉族民众移入今贵州地区,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给贵州的社会经济政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政治上,在今贵州设立众多的卫所、驿站,大量的官兵、汉民居住在土地开阔的交通沿线上,修筑了许多具有中原式风格的城池、屯堡及民居、寺庙等建筑,这是贵州城镇兴起的开始。卫所、屯堡等

军事据点的修筑,标志着贵州经济、文化开发新里程的开始^[14]。

正是这些卫所、驿站和众多汉族移民的进驻,保障了明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统治。自朱元璋在贵州设立卫所起,卫所官兵及汉民侵夺当地少数民族的良田家园,残酷压迫当地土著居民而引起他们不断的反抗,一直延续到明亡。但因卫所的存在,驿站的通畅,明王朝能迅速从中原地区调集大量军队,从湖广开赴贵州、云南,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和土司的叛乱。明朝中期起,政治愈加腐朽,军屯遭到破坏,贵州的军政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藉黔之入不足以当中土一大郡”,必须靠湖广、四川接济。而卫所、驿道保障了四川、湖广和云南的粮饷顺利抵达贵阳,维持贵州军政机器的运转。

卫所及驿站等官兵和广大汉族移民还保障了贵州改土归流的顺利进行。贵州的建省开发史也是“改土归流”的历史。明永乐时,贵州两大土司思州宣慰使田琛与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叔侄为争夺砂坑而“数相攻杀”,明王朝派人调解,“皆拒命不至”^[15]。明成祖朱棣派镇远侯顾成统兵五万擒田琛、田宗鼎,械送京师禁锢,遂将思南、思州两宣慰司地分设思州、新化、黎平、石阡、思南、镇远、铜仁、乌罗等八府,并在此基础上设置贵州布政使司,使贵州成为全国十三布政使司之一,这是明王朝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开始。正是这些卫所等屯军和汉民的大量存在才使得贵州的两大宣慰使被迫就范,兵不血刃地实行了改流。而后,原属贵州宣慰司的程番长官也因“郡多江西、川、湖客民杂处”,于成化十二年七月改置程番府,隆庆二年六月府治移入布政司城,三年三月改府名贵阳。随后,贵州大量的长官司改为州县。明王朝中前期成功地实施改土归流,说明了对这些土司统治地区控制的加强,也表明这些地区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长足的发展,改流时机已经成熟。

经济上,随着明初一百多万军事移民的进入和“调北填南”及商屯、经商、流徙等大量汉人的移民,他们凭借着军事强力和国家政权的保护,抢占良田,驱逐当地的苗、彝、仡佬、布依、侗等民族。而迁来的汉民大多来自中原、江南一带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地区,他们不仅带来大量的劳动力,还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经验和耕作技术。使僻在遐荒的贵州的生产力得到了质的飞跃,缩小了与内地的差距。他们在今贵州地区开辟了大量的良田。即使到了明代中后期的万历年间,卫所、驿站军户人口大量耗减,部分屯田被军官占为己有及一些田

土荒芜的情况下,仍有1714879亩^[16]。

农业的开发与发展也促进了商业的兴起。以众多的卫所府县为中心,形成许多集市,贸易活跃。思南府婺川县因盛产朱砂,“商贾辐辏”,“人咸聚居贸易”^{[12]326}。铜仁府处辰沅上游,“舟楫往来,商贾互集”^{[12]330}。黎平府位于清水江下游,航运发达,又盛产木材,至迟在万历年间江浙、湖广等地的商人已在清水江下游地区进行木材的开采与贸易。普定卫号称“冲要剧地……四方辐辏,为边鄙一都会”^{[17]151},经商之风兴盛。普安卫商业也发达,当地土著“专事商贾”^{[12]342}。

文教上,明代以前贵州以少数民族为主,所谓“昔在荒服之外,民皆夷獠”,“夷习鄙陋”,“茹毛饮血”。自设立卫所、屯堡后,包括经商、仕宦、流寓在内大量的汉民迁移到贵州,改变了当地的居民结构。而且这些移民大多来自江南及中原等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较高的地区,儒学教育也在贵州地区应运而生。明代统治者重视教育,用儒家思想来巩固其统治,把“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之为先”定为“安边”之基本国策。早在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就对来京朝觐的普定军民府知府者额说:“今尔既还,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而归,可以变其土俗同于中国,岂不美哉!”^{[4]2366}。而到贵州任职的流官,大都是科举出身,受到儒家教育的长期熏习,到任后即把“用夏变夷”视为己任,大力发展教育。无论是谪居贵州的王阳明、邹元标还是贵州本土的李渭、孙应鳌,都为贵州的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思南府,参加科举、荣登科甲的人士中出身于长官司的少数民族占到一定比例^{[13]534-535}。

文教的兴盛也带来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贵州当地的土著少数民族受中原强势文化的熏染,风俗渐同中华。如思南府“蛮獠杂居,渐被华风”,石阡府“悉被华风”,黎平府“衣冠习尚一同华风”^{[12]325,329,337}。普定卫:“附郭夷民五种,习尚不同。自立军卫以控制,卫之熏陶,渐染中原衣冠之俗,亦尚义,义而重文,服、食、器、昏(婚)丧之礼皆可观矣”^{[17]151}。

三、结语

明初统一云南的战争,使僻在遐荒的贵州的战略地位凸显,明政府在贵州进行大规模的军事移民。而后民屯、商屯、流民和外来商人等民籍移民相继涌入贵州。一百多万的汉族移民对当时以“蛮夷”为主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的贵州作出了重大

贡献。他们在政治上维护了西南边疆稳定和保障改土归流的顺利进行;经济上,加快了农业的开发和商业的繁荣,缩小与内地的差距;文化教育方面,促进了儒学的传播和发展;民族关系方面,通过移风易俗的努力,加速了民族融合。

注 释:

①明代贵州都司管辖的永宁卫和普市守御千户所今属四川叙永。

②考虑到其中一些士兵无配偶、子女。

③古永继对此基本持否定态度,见《从明代滇黔移民特点比较看贵州屯堡文化形成的原因》,《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王红银认为贵州存在大量民屯,见《明代贵州民屯刍议》,《安顺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参考文献:

- [1] 董春林,赵双叶.从明代人口流动看城池修筑与社会经济的关系[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86.
- [2] 古永继.元明清时贵州地区的外来移民[J].贵州民族研究,2003(1):136-137.
- [3] 吕善长.明代安顺地区移民研究[M]//李建军.屯堡文化研究(2010卷).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 [4] 明太祖实录[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
- [5] 明宪宗实录[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1963.
- [6] 明神宗实录[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
- [7] 吕善长.明代清水江流移的军户人口研究[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2).
- [8] 王毓铨.王毓铨史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5:962.
- [9]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0] 明孝宗实录[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1127.
- [11] 《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第二卷·明代的贵州[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115-118.
- [12] 谢东山.嘉靖贵州通志[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
- [13] 洪价.嘉靖思南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成都:巴蜀书社,2006.
- [14] 侯绍庄,史继忠,翁家烈.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311.
- [15] 明太宗实录[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1662.
- [16] 王来贤.万历贵州通志[M].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22.
- [17] 沈庠.弘治贵州图经新志[M].贵阳:贵州省图书馆,1985.

[责任编辑:刘宗碧]

Immigrat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 Ming Dynasty in Guizhou

LV Shan-chang¹, ZHANG Ming²

(1. Research Center of Tunpu Culture of Guizhou Province, Anshun University, Anshun, Guizhou, 561000, 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immigrants in Guizhou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military immigration, registration immigration and official immigration, among which military immigration was largest in numbers and had the most far-reaching impact. According to conservative estimates, the number of military immigrant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was more than one million. Thi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education, and folk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Guizhou.

Key words: Ming dynasty; Guizhou; categories of immigrants; impact